

# 东盟“伊斯兰化”与 东盟 10 国对以关系的互动研究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要:** 冷战结束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发展和东盟扩大创造了条件。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近年在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深化, 这两国出于宗教情感而持反以亲阿的态度, 并将其变为东盟意志, 无视东盟大多数成员为非伊斯兰国家且与以色列合作良好的事实。这既体现了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现实在东南亚的投影, 又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宗教转向”和东盟国家在伊斯兰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以色列实际上已成为东盟伊斯兰与非伊斯兰成员国之间的宗教“柏林墙”。欧盟模式应是东盟可资借鉴的方向, 东盟制度建设乃至维系存在的基础在于: 一是加强东盟制度民主建设, 二是东盟机构的“去宗教化”。马来西亚和文莱可以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宗教组织发出其宗教诉求, 但东盟绝非在宗教上的合适平台。

**关键词:** 东盟; 以色列; 伊斯兰化; 东南亚一体化; 宗教“柏林墙”

**中图分类号:** D83/87.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2)04-0001-09

随着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 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极大冲击了西方设计的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制度, 美国的国际金融霸权对于全球经济的劫持更是一览无余。尽管也遭遇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东亚和中东作为世界经济最具发展潜质的地区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不仅如此, 东亚和中东日益成为世界大国关注的战略焦点, 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的战略重心始终在东亚与中东之间徘徊。相较于东北亚复杂的政治格局而言, 东南亚一体化在东盟的框架下取得丰硕的成果。作为东亚地区小国联合自强的工具, 东盟国家积极用东盟的集体身份发展对外关系, 除了欧美大国之外, 其交往重心也包括中东地区。由于中东地区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 东盟与海合会建立了地区组织之间良好合作关系。在对海合会所代表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上, 东盟 10 国目标整体一致; 在对中东地区唯一的犹太教国家以色列的关系上, 尽管绝大多数东盟国家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发展了实质关系, 但由于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激烈反对, 东盟拒绝与以色列发展

收稿日期: 2011-10-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海合会的大国外交战略研究”(KA159225); 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冷战后大国中东安全战略比较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规划基金项目“海合会与东盟经贸合作关系研究”(KX171242)

作者简介: 钮松,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站博士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外交关系,并不断在持续已久的巴以冲突中单方面谴责以色列。以色列成为东盟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这种分歧甚至会影响到东盟的机制建设和东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 一、东盟:东南亚共同体还是伊斯兰共同体?

东盟 1967 年成立之初作为政治、军事组织而存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是其创始会员国。面对着美苏争霸、中苏对抗以及中国在许多东南亚国家“革命输出”,美国加强了在东亚地区对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对共产主义充满恐惧的相关东南亚国家组建东盟,其目的既在于协调彼此,形成安全和防务上的合作机制,也在于以集体的形式参与亚太地区大国主导的东亚国际关系。这一时期的东盟,其在东南亚的代表性有限。随着冷战的结束,东盟自 1992 年开始实现转型,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社会主义和泛社会主义国家随后也加入东盟。1999 年开始,东南亚所有国家均成为东盟成员国。<sup>①</sup> 由于东盟长期以来关注的是其内部的整合,尤其是从具有反共意识形态的政治军事组织向超意识形态的经贸组织的拓展,学界对于其东南亚共同体的身份毫无疑问。东盟也通过“东盟方式”努力用同一个声音表达东南亚的意愿,其包括六大规范和四大原则。六大规范是:1. 主权平等;2. 不诉诸武力、和平解决争端;3. 不干涉内政;4. 东盟不卷入激化其成员国双边冲突的活动;5. 沉默外交(quiet diplomacy);6. 相互尊重与容忍;四大原则是:1. 开放的地区主义;2. 协作安全;3. 软规则(soft rules);4. 达成共识。<sup>[1]</sup> 由于东盟内部协商一致的关键性,因此,东盟不断谴责以色列的声明与多数东盟成员国与以色列之间的良好互动存在较大反差,实际上大多数东盟成员国在东盟外交中的以色列问题上屈从于少数伊斯兰国家的强硬态度,这并不符合“东盟方式”。其实早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就有学者敏锐意识到“东盟的官方哲学已成功地将伊斯兰的崛起纳入其中”。<sup>[2]</sup> 而东盟在巴以争端中一味谴责以色列并偏袒巴勒斯坦的做法强烈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以色列是全世界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敌人及其眼中的“撒旦”。那么,东盟究竟是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经贸组织,还是伊斯兰宗教组织?或曰究竟是东南亚共同体还是伊斯兰共同体?进入 21 世纪,东盟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时代背景,任何关键性的影响因素都会对它的机制建设和东南亚地区一体化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东盟在加快地区一体化的同时,不顾大多数成员国与以色列建交且发展多层次合作关系的事实,对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的责任过分夸大,这实际上体现了冷战后国际体系转型带给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这体现了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现实在东南亚地区的投影。二战行将结束之时开始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其目标是确立“国际四警察”(美苏英中)以及后来的 5 强(美苏英中法)对于战后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其基础是美苏在欧亚划分势力范围上达成的妥协。在欧洲,美苏之间相对克制;而在亚洲,由于中国共产党并不屈从于苏共的压力而在战后不久便统治了中国大陆,此后由于中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共对东亚地区革命武装的支持,这又引起了中美苏三边关系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巨变。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型时期,东盟于 1967 年 8 月 8 日成立,这恰恰反映了印尼等 5 国在中苏美之间的小心翼翼。1967 年 10 月,尼克松在当选总统前便在《外交季刊》发表《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这显示出美国政界对美国亚洲政策的新观点,毛泽东很快捕捉到其中的新意。<sup>[3]</sup> 1969 年初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及同年 3 月中苏爆发的珍宝岛冲突促使了中美的靠拢。随

<sup>①</sup> 2002 年 5 月 20 日,东帝汶从印尼独立。近年来,东帝汶加入东盟问题得到了柬埔寨的支持,但遭到新加坡的反对。

着 1971 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 1972 年尼克松访华的实现,中美建立了长达近 20 年的准联盟关系<sup>①</sup>(直至 1989 年)。东盟当时的首要目标和最为紧迫的任务是防范一切可能引发安全问题的因素,其中也包括共产主义的“革命输出”。但这并不能完全推导出东盟是反共组织,有学者指出,“尽管事实如此,即 5 个非共产主义且与西方建立密切关系的东南亚国家建立了东盟,但东盟并非是反共地区组织”;另一些更重要的事实是,越南和老挝因战乱而非政权性质而没能获得东盟的邀请,文莱此时尚未独立,缅甸与柬埔寨害怕影响到自身的“中立地位”而拒绝了东盟的邀请。<sup>[4]</sup>中美关系的缓和更是让东盟 70 年代开始便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尽管中美缓和,苏联在 1986 年走上了改革之路,东盟在冷战期间唯一的一次扩大是 1984 年文莱的加入。1979 年至 1991 年的中越对抗,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直至 1991 年撤军,东盟事实上一直站在中国一边支持“民主柬埔寨”作为柬埔寨的合法政府,反对越南及其扶植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1991 年中越和解以及苏联的解体使越南与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历史契机,冷战的结束使得东盟对苏联和越南在中南半岛的武力忧虑消除,这与西方世界对于共产主义威胁的感知有着共通之处。越南等国 1992 年起积极参与东盟活动,东南亚其他国家陆续在 2000 年之前加入东盟。

冷战结束的 1991 年到“9·11”事件发生的 2001 年这 10 年是国际体系转型、各种力量和思想进行博弈的 10 年。从国际关系的事实来看,伊斯兰激进势力确实取代了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威胁。正如美国前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2002 年 11 月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EI)论坛上指出,伊斯兰的“绿色威胁”已取代了共产主义的“红色威胁”。<sup>[5]</sup>东盟在将越南等社会主义和泛社会主义国家吸收之后,伊斯兰激进主义对东盟内部协调机制和共同外交开始产生巨大影响,尤其表现在东盟对以色列的否认和谴责之中。东盟在冷战后谋求建立全球联系的努力遭遇瓶颈。

第二,这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宗教转向”和东盟国家在伊斯兰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当代国际关系的“宗教转向”与全球治理的背景息息相关,虽然西方将“绿色威胁”视为“红色威胁”的继任者,但这种威胁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这实际上反映了两极格局下不断酝酿、发酵的宗教因素在冷战后爆发出来,对于国际关系产生了明显的、实质的巨大影响。基督教右翼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拉美的“解放神学”更是试图引导拉美突破对于西方的依附。由于美苏争霸不断侵蚀中东地区,1979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口号便是“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并开始在全球推广轰轰烈烈的伊斯兰革命,这标志着伊斯兰教参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的开始,但其意义在当时并未得到有效的重视,各种伊斯兰激进势力成为美苏竞相合作的准盟友。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促使美国与本·拉登和塔利班等伊斯兰激进势力之间的准联盟关系在 90 年代开始瓦解,直至 2001 年彻底决裂。<sup>[6]</sup>21 世纪以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单元,国际社会关注的全球公共问题,既包括传统的安全问题,也包括气候、环保、汇率等领域。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回归,通过全球治理大背景而获得了部分的参与合法性;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宗教议题也涵盖了政治、安全、金融和自然等诸多领域。正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宗教转向”尤其是伊斯兰教参与国际关系的强势地位,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尤其是前两者)的伊斯兰国家身份对于东盟的中东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2001 年以前尤其是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前,伊斯兰教对东盟外交影响有限,没有材料证明东盟对其成立之后的多次中东战争和巴勒斯坦人的“因提法达”表达了强烈的反以亲阿的态度;即便是 1973 年中东战争的石油危机导致西方许多国家开始在阿以之间寻求平衡时,也未见东盟对此有何改变,因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的增长率并未立刻受到第

<sup>①</sup> “准联盟”即为联而不盟,是一种非正式安全合作机制。具体参见孙德刚《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 年。

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危机后采用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以及更高的出口增长率帮助其保持更高的经济增长。”<sup>[7]</sup>

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勃兴及其全球恐怖网络的构建引起了印尼等东盟成员国的担忧。2001年以来,东盟内部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等伊斯兰国家和其他非伊斯兰国家均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保持零容忍,如2011年9月东盟10国军事情报官员“同意通过分享和交换经验与情报的方式来扩大在打击伊斯兰武装人员方面的合作”;<sup>[8]</sup>但马来西亚等国在面对巴以冲突时,一方面谴责以色列,一方面无视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对包括以色列平民在内的所有无辜平民的暴力活动,并将其上升为东盟的意志,而这又与东盟之前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打击政策相悖,造成东盟在同一问题上的截然相反的并行态度。不仅如此,伊斯兰问题的凸显及其在东盟层面话语权的掌控会激化东盟成员国在穆斯林政策上的矛盾和冲突。除了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3个伊斯兰国家以外,东盟其余7国拥有不同数量的穆斯林:越南和老挝穆斯林人口较少,柬埔寨和新加坡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这4国穆斯林政策相对宽容;而泰国、缅甸和菲律宾则拥有大量的穆斯林且往往与民族分裂主义相联系,这些国家对于穆斯林分离主义的打击、同化或歧视行为又被视作佛教或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在冷战结束前,泰国和菲律宾的穆斯林问题从来不是东盟的议题且不会深度影响到东盟内部的团结;冷战结束后至“9·11”之前,尽管缅甸军政府遭到西方的人权指责以及1997年4月15日发生了佛伊宗教冲突,冲突的背景中就包括“军政府内部有人试图借宗教骚乱惹恼印尼和马来西亚以阻止缅甸加入东盟的因素”,<sup>[9]</sup>但东盟还是坚持在1997年7月吸收缅甸为成员国,并没有在宗教问题上大做文章。“9·11”以后,随着伊斯兰化在东盟的加深,东盟在中东和平问题上开始了大幅度的反以亲阿,东南亚国家内部的穆斯林问题成为影响东南亚安全共同体构建的负面因素,“东盟方式”所体现的规范与原则在以色列和穆斯林问题上实际上在东盟层面已经失效。

## 二、东盟10国与以色列的多维关系

以色列因素对“东盟方式”和东盟共同外交走向产生了负面影响,考察东盟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或亲密或隔绝的关系至关重要。除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以外,东盟其余7国均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甚至连印尼这个世界最大的伊斯兰国家也与以色列建立了半官方联系,只有马来西亚和文莱对以色列持强硬态度。东盟国家与以色列的往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定位:经贸合作与安全防务合作。

第一,东盟国家与以色列的经贸合作,主要涉及缅甸、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泰国和印尼等6国。由于以上6国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的差异,它们与以色列之间的经贸合作也存在不同的偏向,其具体领域又分为3种:(1)农渔产品贸易与技术支援,主要以缅甸为代表。缅甸是东南亚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两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缅甸历经政权更迭并长期因军政府问题遭遇国际社会的孤立,但以缅双方一直保持着关系。虽然以色列拥有先进的农业技术,但由于国土地处沙漠且淡水资源有限,以色列需要在淡水渔业方面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合作,拥有良好气候和淡水资源的缅甸成为以色列的目标,而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缅甸也在寻觅先进的农业技术,以色列成为缅甸的目标。以色列从1994年开始便参与对缅甸农牧业人才的技术培训,2010年11月,缅甸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180名农业与畜牧业学员前往以色列参加为期11个月的培训项目。过去10年已有1200名缅甸学员赴以色列受训,其中2009年为109名,“所披露的项目将包括现代农业、电脑化灌溉系统、病虫害防治、市场营销、收成后(运作)、畜牧业已经干旱地区的发展等。”<sup>[10]</sup>以色列还打算利用缅甸良好的淡水资源进行淡水小龙虾的养殖,一家以色列公司于

2008年打算在缅甸的端迪(Twante)建立试验农场,该地为缅甸最好的渔业区域之一。缅甸渔业部门的一名负责人透露“这将是一个试点的养殖计划,并且将是该物种首次引入到该国”,“该公司将从农民手中购买这些养殖的龙虾并将其出口。假如该计划进展良好,我们可将其出口到俄罗斯。”<sup>[11]</sup>(2)对以劳务输出,菲律宾、泰国在此方面占了很大比例,越南开始涉足。长期以来,家政与护理人员的劳务输出已成为菲律宾的支柱产业和品牌,对于以色列而言,其有很大的劳动力缺口。目前在以色列的菲律宾人约3.1万人,其中大部分为护理人员(caregivers),其中许多人在酒店和餐馆工作;他们主要集中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海法,也有部分在贝尔谢巴、内塔亚、雷霍沃特和里雄莱锡安等城市;不仅如此,由于菲律宾劳务人员在以色列的庞大群体和悠久历史,“在以菲律宾人社群联合会”(FFCI)多年来成为团结在以菲律宾劳务人员并维护其利益的自发民间组织。<sup>[12]</sup>以色列每年所需的外籍劳工(guest workers)数量约为4000-5000人,泰国劳工占据了其中60%的份额,这激发了越南对以劳务输出的极大热情,到2010年为止,越南在以劳工仅为236人。<sup>[13]</sup>(3)商业与高新科技合作,以越南、泰国和印尼为主要代表。越南自革新开放后,其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局面,国家开放力度和对外依存度不断扩大,以色列除与缅甸展开农业合作之外,发展与越南之间的高新科技农业也是其目标,以越两国于2010年确定在越南修建价值5亿美元的高科技奶牛场,计划奶牛30000头,日产奶50万升,可满足越南40%的牛奶日消耗,如以色列驻越大使馆官员所言“我们拥有技术、资本、商业合同以及来自与大量发达国家的经验,而越南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sup>[14]</sup>由于以越之间商业往来的密切,双方于2004年8月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2009年8月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以进一步消除投资障碍。泰国在发展对以科技合作上不遗余力,泰以之间已召开了3次“科技合作会议”。第一次是2009年7月14-15日,主题是血液与干细胞、传染性疾病、农业技术和微型藻类生物技术;第二次是2010年8月30-31日,主题是血液与干细胞、疟疾、农业技术和微型藻类生物技术;第三次是2011年5月30-31日,主题是绿色能源、收获后技术、收获前技术以及对农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生产力提升。<sup>[15]</sup>印尼虽然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但两国在经贸领域有着切实的往来,这得益于瓦希德总统在1999年的开启,他的态度是“尽管排除了官方的联系,但是一系列伊斯兰国家平静地与以色列展开商业往来”。<sup>[16]</sup>2009年8月,首个以色列商务代表团访问印尼,而在此之前的2006年,印尼工商总会访问了以色列。即便如此,印以间贸易额仍然有限,2009年上半年仅为4780万美元(其中以色列对印尼出口额为520万美元),比头年同期下降了60%。<sup>[17]</sup>

第二,东盟国家与以色列的安全防务合作。东盟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安全防务合作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其不同时期的目标有着很大的不同。尽管东南亚地区由安全复合体向安全共同体迈进,东盟便是促进东南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制度保障,但安全共同体建构与去军事化并非同语,至少东盟国家还面临着来自地区外大国的安全威胁,这种安全威胁甚至影响到机构本身,连欧盟这种“民事力量”的代表近年也出现了向“军事力量”适度变形的倾向,<sup>[18]</sup>东盟就更不在话下。东盟国家与以色列的安全防务合作依程度不同主要可分为两大类:(1)具体的以色列武器和军事技术的输入,缅甸、泰国和印尼是主要国家。由于缅甸较早承认以色列,因此以色列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向缅甸输入武器。1954年,首个缅甸军事代表团访问以色列;50年代中期,以色列向缅甸出售30台二手泼马林(supermarine)喷火战斗机及相关设备、机枪弹药、炸弹、火箭弹和备用发动机零部件;1958-1959年,摩西·达扬将军与奈温将军实现了互访。缅甸1962年的政变对缅甸以军事合作产生了冲击,直到80年代末期才有所恢复,以色列此后向缅甸秘密出售了大量先进武器,“以色列的地区基石将仍旧是新加坡,但有可能特拉维夫相信缅甸可以在东盟内部提供另一种影响途径”。<sup>[19]</sup>泰国和印尼在进口以色列武器方面时间跨度和种类均低于缅甸。由于泰国长期以来采取务实和中立的外交态度,长期未卷入战火,尤其是二战及战后的印度支那战争,军备更新问

题相对缓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泰国南部穆斯林分裂主义的暴力活动以及断断续续的泰柬边境冲突促使泰国近年加大对武器的输入,其中涉及以色列武器。2008年,泰国决定向以色列购买总价值3010万美元的15037支TAR-21战术突击步枪以及总价值440万美元的531挺内盖夫(Negev)轻型机枪,资金来自于确保泰马边境安全的特别预算,因为“穆斯林分离主义叛乱分子持续袭击士兵和平民”。<sup>[20]</sup> 印尼作为东盟的核心大国,其防务能力对于东盟有着重要意义。印尼对于以色列武器的采购虽然招致国内伊斯兰激进团体和一些议员的反对,但仍然深化与以色列的武器贸易。2003年,以色列航空工业(IAI)在雅加达开设分支机构,这也是以色列军方公司在伊斯兰国家的首个分支机构,相关合作协定由以色列航空工业的贝德克(Bedek)飞机改型部门和印尼加鲁达(Garuda)航空公司维修子公司签署。<sup>[21]</sup> 2006年,印尼在与以色列经过3年的防务合作谈判之后,决定向以色列购买“搜寻者2号”无人机以及4套无人机系统。<sup>[22]</sup> 这是印尼和以色列有据可查的历史上第一笔公开的武器交易。(2) 以色列帮助新加坡打造一支以色列式的军队并提供先进武器,以新建立了军事盟友关系。新加坡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时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和地区背景,不仅国土狭小且无军队,其生存也受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挑战。新加坡在被印度和埃及拒绝后,请求以色列帮助建军。1965年12月,包括雷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和本杰明·本-埃莱泽(Benjamin Ben-Eliezer)在内的以色列国防军代表团抵达新加坡,他们按照以色列国防军的模式秘密打造新加坡军队,1969年以色列驻新加坡大使馆开馆后,以色列国防军军事代表处设在其中并开始积极运作。<sup>[23]</sup> 亚可夫·埃拉扎里(Yaakov Elazari)负责组建新加坡国防部,耶胡达·古兰(Yehuda Golan)负责军事设施建设。经过数10年发展,以色列的新加坡建军行动成效斐然,“今日的新加坡军队被认为是东南亚最强大、最先进的军事力量。以色列与新加坡国防机构之间的联盟得到深化和拓展,并且现在还包括两国军事工业间的合作”。<sup>[24]</sup> 由于两军之间的特殊关系,新加坡已成为以色列武器的最大买家之一,如2008年,新加坡决定采购以色列SPYDER地对空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以更新目前使用了20余年的旧系统;2010年,以色列向新加坡出口了目前最先进的“保护者”无人艇,这些只是以新之间武器贸易的缩影。

不难看出,东盟国家因与以色列的政治关系不同而导致经贸合作和安全防务合作的深广度有所不同。缅甸与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便与以色列建立了亲密的经济和军事关系;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在经贸领域有着不同的合作优势;印尼虽近年发展对以贸易和间接向以色列进口武器,但囿于伊斯兰国家身份以及无外交关系而难以达到更高的水平;柬埔寨和老挝由于经济发展和外交能力有限,几乎与以色列没有深度联系,以色列也并未在此两国独立设置使馆;马来西亚和文莱依旧对以态度僵硬。

### 三、以色列:东盟与东盟非伊斯兰成员国间的隔离墙还是柏林墙?

由于中东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且人口过剩,东盟在中东地区主要的合作伙伴是海合会国家。海合会国家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土地贫瘠、劳动力短缺,这与劳动力农业资源丰富的东盟国家成为极好的互补。<sup>[25]</sup> 但在高新技术方面,海合会国家和东盟国家都面临技术短缺的问题。许多东盟国家在民事技术上,如农业灌溉、渔业养殖等,向以色列寻求帮助;在军事技术上,如先进武器进口乃至军队建设上,与以色列有着密切合作。甚至大部分海合会君主国(除巴林外)也与以色列有着商贸关系和军事安全上的实质合作。即便如此,马来西亚和文莱将其僵硬的反以态度成功“上载”为东盟的反以决策。由于马来西亚和文莱在东盟层面所能获得的是东盟对于以色列的强烈谴责,目前却不能实现东盟对于以色列的完全抵制,这反映了东盟伊斯兰成员国与非伊斯兰成员国之间在东盟框架内的博弈,印尼则在以色列问题上态度相对缓和。东盟的政策与非伊斯兰成

员国对以政策之间出现隔阂,这种因以色列而产生的隔阂在将来会发展成为东盟与东盟非伊斯兰成员国之间的“隔离墙”(Separation Barrier)还是“柏林墙”(Berlin Wall)值得深究。以色列修建隔离墙的目的在于防御哈马斯和其他伊斯兰激进势力通过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袭击以色列,其核心是安全利益。以色列并不禁止巴勒斯坦普通民众进入以色列控制区内工作,以巴经济事实上处于一体化的现状。换言之,隔离墙所要隔绝的是伊斯兰恐怖主义而同时保持普通巴勒斯坦经济和人员流动的通畅。东德政府修建柏林墙的目的是为了阻截源源不断的东德公民投奔“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西方的行为,并将此墙命名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冷战的结束便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实质上代表了观念与意识形态的隔绝。

纵观马来西亚和文莱在黎以战争、加沙战争和加沙救援船遇袭等事件上的强硬态度,其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巴勒斯坦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利益而将以色列视为安全威胁,但东盟是东南亚共同体而非伊斯兰共同体,东盟本身就是多元宗教、文明和政治体制妥协的产物,东盟无法承载起捍卫伊斯兰世界安全利益的功能。不仅如此,连印尼这个世界最大的伊斯兰国家都从以色列获得安全利益,以色列从未构成对东盟所有成员国的直接安全威胁。其余成员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经贸和安全合作也引起了马来西亚的不满,如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Chaim Herzog)1986年访问新加坡便招致了“马来西亚针对新加坡政府的批评甚至示威活动”。<sup>[26]</sup>因此,以色列绝非东盟与那些非伊斯兰成员国之间的“隔离墙”。事实上,马来西亚与文莱主要从伊斯兰宗教认同而非理性的是非曲直上采取反以态度和行为,由于这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有限,因此东盟的“伊斯兰化”目标成为其提升在中东问题上话语权的工具。印尼与马来西亚、文莱的差异性来自于它对伊斯兰教政治化的相对限制态度,印尼采取了一种世俗主义的实用主义行为方式。马来西亚和文莱近年来力图在东盟与东盟非伊斯兰成员国构建宗教“柏林墙”的行为与其国内伊斯兰教政治化程度之高有着密切联系。

伊斯兰复兴运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催发了马来西亚的正面回应,马来西亚国内的政治斗争引发了作为世俗民主国家的马来西亚政府、社会和个人全部积极参与,其氛围十分浓厚。伊斯兰教1970年开始进入马来政治,80-90年代与政治关系密切,1999年以来与政治融合,其中马哈蒂尔总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up>[27]</sup>文莱自1984年独立后,其王室实施的集权统治以伊斯兰教为合法性来源,伊斯兰教在文莱发挥着异乎寻常的政治作用。而印尼政府对于伊斯兰教一直持压制态度,直到80年代才有所顺应。不仅如此,文莱盛产石油且财富总量雄踞东盟之首,而马来西亚则是地区大国,双方的结合在东盟机构中拥有了较强的话语权。传统的东盟决策机制及“东盟方式”主要适用于促进东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即从安全复合体向安全共同体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及迈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但这些并不适用于东盟迈向全球作为国际行为体的对外决策,东盟少数伊斯兰成员国获取东盟在对以关系上的话语权便是明证,东盟的反以态度与东盟7个非伊斯兰成员国以及印尼加强与以合作的态度呈鲜明反比。正如阿米塔·阿查亚所言“东盟处理本质上是外部的相互冲突的能力不仅会减弱(尽管它可能对冲突有适度的影响),而且,争端可能会给东盟内部的团结带来严峻的考验,包括东盟提供一种与外部大国相对应的共同立场的能力。”<sup>[28]</sup>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东盟国家难以通过自身力量渡过难关。东盟国家也有贫富之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分、宗教之分,一味推进伊斯兰政治化只会让马来西亚、文莱和东盟在全球事务中走向孤立,甚至会加深其国内的宗教和种族矛盾,也对中东局势的改善无助。印尼的世俗主义和实用主义外交则能为中东局势的改善起到正面作用,如2006年黎以战争之后,以色列虽坚持“非以色列邦交国”不得向黎巴嫩派出维和部队,但对印尼网开一面,却对马来西亚坚决抵制,不仅如此,以色列与印尼代表还以“私人”身份探讨印尼派兵具体时间。<sup>[29]</sup>马来西亚、文莱正是在与印尼组成3国联军的基础上才利用以色列与印尼的良好关系派出维和部队以真正为中东和平进程出

力。

卡尔·特洛基( Carl Trocki)早在东盟未扩大的1980年便意识到伊斯兰教对东盟地区团结( regional unity)的威胁。<sup>[30]</sup> 欧盟模式应是东盟可资借鉴的方向,作为“基督徒俱乐部”的欧盟虽然存在机制上的“民主赤字”,但从未试图将自身变成“基督教俱乐部”。尽管存在争议,土耳其的入盟候选国身份依旧有效。东盟是异质文明的聚合体,其机制上的“民主赤字”远甚于欧盟,东盟制度建设乃至维系存在本身的基础在于:首先,加强东盟制度民主建设,东盟制度民主建设速度可以早于东盟许多国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培养;其次,东盟机构本身的“去宗教化”,即拆除东盟与东盟非伊斯兰成员国之间的宗教“柏林墙”。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可以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宗教组织发出自身的宗教诉求,但东盟绝非在宗教上的合适平台。

注释:

- [1] Jörn Dosc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Asia-Pacific: ASEAN”, in Michael K. Connors, Rémy Davison, Jörn Dosch (eds.),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Routledge Curzon, 2004, p. 81.
- [2] David M. Jones and Michael L. R. Smith, *ASEAN and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gional Delus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p. 220.
- [3] Richard H. Solomon, *Chinese Political Negotiating Behavior, 1967-1984*, Rand, 1995, p. 168.
- [4] Dewi Fortuna Anwar, “ASEAN’s Enlargement: Political, Security,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in Mya Than and Carolyn Gates (eds.), *ASEAN Enlargement: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1, p. 27.
- [5] James Jennings, “Iraqophobia Versus Reality”, in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Michael Thompson (eds.), *The Logos Reader: Rational Radicalism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6, p. 289.
- [6] 钮松《国际体系转型与美国—塔利班关系》,《南亚研究季刊》2010年第2期。
- [7] Shankar Sharma, “Structural Change and Energy Policy in ASEAN: Toward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Kernial Singh Sandhu and Sharon Siddique (eds.), *The ASEAN Read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p. 261.
- [8] “ASEAN Agrees Data-sharing to Fight Islamic Militants”, *Reuters*, September 28, 2011.
- [9] 许利平《当代东南亚伊斯兰发展与挑战》,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 [10] Myo Lwin, “Israel Takes Biggest Batch of Trainees”, *Myanmar Times*, November 8-12, 2010.
- [11] Sann Oo, “Lobster Farming Tested in Twante”, *Myanmar Times*, March 24-30, 2008.
- [12] Atty Ignacio R. Bunye, “Filipinos in Israel”, *Manila Bulletin*, August 1, 2010.
- [13] VNA, “Labor Exporters Urge Accord with Israel”, *Tuoi Tre News*, August 19, 2010.
- [14] “Israel Talking Hi-tech”, *Vietnam Investment Review*, March 21, 2011.
- [15] NSTDA, “NSTDA and Israel”, March 15, 2011, <http://www.nstda.or.th/eng/index.php/linkages/international-collaboration/nstda-and-israel>.
- [16] “Israel Welcomes Indonesia Trade Offer”, *BBC News*, November 6, 1999.
- [17] Sharon Dror, “First Israeli Business Mission Visits Indonesia”, August 5, 2009, <http://www.israelgateway.com/articles/133/>.
- [18] 陈志敏《欧洲联盟的军事化:从民事力量向军事力量的变形》,《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
- [19] William Ashton, “Myanmar and Israel Develop Military Pact”,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March 1, 2000.
- [20] Patrick Winn, “Thailand Plans \$191.3M Arms Purchase”, *Defense News*, September 12, 2008.
- [21] “‘Yediot Ahronot’: IAI Opens Indonesia Branch”, *Globes*, November 3, 2003.
- [22] “Indonesia to Buy Searcher 2 UAVs from Israel”, *Defense Update*, October 27, 2006.
- [23] Yossi Melman, “Was Iron Dome Defense System Actually Built for Singapore?”, *Haaretz*, March 25, 2010.
- [24] Amnon Barzilai, “A Deep, Dark, Secret Love Affair”, *Haaretz*, July 16, 2004.

- [25] 钮松 《东盟-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 现状、基础及特点》,《南洋问题研究》2011 年第 1 期。
- [26] Leszek Buszynski, “ASEAN’s Changing External Relations”, in Kernial Singh Sandhu and Sharon Siddique (eds.), *The ASEAN Read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p. 483.
- [27] 范若兰 《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第 240 – 249 页。
- [28] 阿米塔·阿查亚 《建构安全共同体: 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298 页。
- [29] “Israel Drops Objections vs. Indonesia”, *Ynet News*, September 1, 2006.
- [30] Carl Trocki, “Islam: Threat to ASEAN Regional Unity”, *Current History*, vol. 78, no. 456 (April 1980).

[责任编辑: 许丽丽]

##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SEAN’s “Islamization” and Ten ASEAN Member States’ Relations with Israel

NIU Song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end of Cold War promotes Southeast Asian integration and ASEAN’s enlargement. In recent years, a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Malaysia and Brunei, the two countries upload their “anti-Israel, pro-Islam” attitudes as ASEAN’s foreign policy and ignore all the ASEAN non-Islamic countries’ good relations with Israel. This reflects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its shadow in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the “religious turn”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openness of ASEAN countries’ disparity in Islam. Israel indeed becomes the religious “Berlin Wall” between ASEAN and its non-Islamic member states. The EU model can be a reference for ASEAN. The base of ASEAN’s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its existence are the institutional democracy construction and “de-religionization” of ASEAN. The best channel for Malaysia and Brunei to convey their Islamic requests is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such as OIC, while ASEAN is not a comfortable platform.

**Key words:** ASEAN, Israel, islamization, Southeast Asian Integration, religious “Berlin Wall”